

周口人民难忘的邓塞林同志(下)

□王羨荣 文/图



这张照片是1951年邓塞林同志送给笔者的。(翻拍)

笔者与邓老的交往

邓塞林是笔者参加工作的介绍人，后来又在单位工作，他一向对笔者关心、爱护，关系很好，笔者的进步离不开他的启蒙帮助。

1947年，笔者小学毕业后因交不起学费未能上初中。1950年，笔者在沙颍河南岸剪股街一家百货店当店员，当时邓塞林是原周口市人民政府建设科科长，他常去店里与老板闲谈，有时也与笔者聊上几句。那时，原周口市刚成立不久，各单位还处于起步阶段，很需要干部。笔者很想去机关工作，但找不到介绍人，邓塞林看笔者聪明，写的字比较好，又是贫民出身(当时家庭出身很重要)，就问笔者：“你愿意去机关工作吗？”笔者求之不得，便高兴地答应了。之后，邓塞林给原周口市人民政府人事科写了一封信，人事科将笔者安排到原周口市人民政府合作科(供销社前身)工作。

1951年春，原周口市人民政府合作科改为原周口市合作总社，从市政府院内迁至沙颍河北岸磨盘街，邓塞林调任合作社主任。从此，笔者和他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。那时，笔者才17岁，在秘书科工作，负责收发、誊写文件。由于文化水平低，又无机关工作经验，邓

塞林经常帮助笔者。此外，邓塞林还要求笔者每天按时完成工作任务，要求笔者抽时间学习党的方针政策，多看报纸，了解时事，武装头脑。笔者爱看报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。

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，邓塞林是笔者参加工作的介绍人，是笔者的老领导，从年龄上说，他还是笔者的长辈，所以笔者对他非常敬重。1958年反右派时，邓塞林遭受迫害，回老家劳动。1974年，邓塞林来周口访友，尽管生活非常困难、粮食供应紧张，笔者仍将他安置在自己家，以粗茶淡饭相待，并冒险陪其访友。1982年，邓塞林从河南省供销干部学校离休，笔者每次去省里开会、办事都会去他家坐坐。1984年，笔者被原周口地区政协聘为“文史研究员”后，萌发了在《周口文史资料》上介绍邓塞林生平的想法。1992年3月下旬，笔者在郑州开会期间，向邓塞林讲了这个想法，请他进一步介绍情况，但邓塞林淡泊名利不肯提及往事。经笔者再三要求，邓塞林才勉强同意。当时，邓塞林的身体已大不如前，说话时喘不上气，但他硬撑着将自己的情况向笔者介绍清楚。后来，笔者怀着敬仰之情，整理好《访邓塞林同志》一文，发表于《周口文史资料》上。

对待同事亲如家人

1948年1月，原周口市(现川汇区)人民政府成立。在刚刚成立的两三年中，单位少、人员缺，全市不过一二百名干部，其中大部分人都认识邓塞林。邓塞林对同事爱护有加，亲如家人，表扬多批评少，与同事说话讲究方式，总是挥着手势说：“你很好！”接着就说对方的优点，如果有缺点，也会婉转地说：“如果注意一下某某问题，那就更好了。”

邓塞林在原周口市合作社工作时，发现有些同事轻视“半社会主义经济性质”的合作社，他们感觉市委、市政府、国营公司牌子正，合作社不像个正式单位，在那里工作脸上没有光彩，工作上不起劲，而且邓塞林还听到本单位的同事反映：“外单位有位同志为抬高自己，贬低别人，把干部分为四等。一等是市委和群团的干部；二等是市政府下属科室的干部；三等是国营公司的干部；四等是合作社的干

部。”合作社一些干部听了这话更不安心工作，邓塞林发觉后，及时召开了全体干部会，让大家讨论合作社对恢复经济建设的重要性，从而消除了合作社一些干部的思想情绪，让他们安下心来工作。邓塞林还通过有关领导，对那位说错话的同志作了严肃批评，使之认识了错误，不再胡说乱讲。事实上，当时合作社的摊子大、任务重，工作非常重要。

邓塞林身为原周口市合作社的主任，平易近人，在生活上与同事打成一片，说话不分官兵，但是工作非常认真，对下属要求严格，下属出了差错，他照样批评。当时，合作社每周日定期召开检讨会，每位工作人员都要检查一下自己在工作和生活的成绩和缺点，然后再让大家补充，有时互相提的意见很尖锐，同事之间弄得“脸红脖子粗”，但为了互相帮助，搞好工作，大家都不计较个人得失。

将周口看作第二故乡

邓塞林离休后，坚持学习，即使生病住院也要看书、看报，学习党中央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和邓小平同志的“南巡”讲话。

邓塞林对周口有着深厚感情。笔者每次到郑州开会都会带着周口老友的问候去看望他。他念念不忘周口，经常向笔者询问周口的发展、变化情况，他确实把周口看作他的第二故乡。1974年，尽管生活困难，邓塞林还是到周口进行了访友。1984年，邓塞林曾两次到周口拜访老友。现在周口70岁以

上的老人，大都还记得当年为周口作过贡献的老邓同志。

邓塞林于1997年去世，享年85岁。邓塞林的老伴是随他一起吃苦受罪的贤妻良母，于2005年去世。邓塞林的女儿邓小塞，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开封高中，在北京深造后，从事外交工作。邓塞林的长子邓政协为省某高校高级讲师，次子邓国庆在郑州市动物园工作，现均已退休。

厄运袭来接连受挫

1952年春，周口同全国一样开展了“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对官僚主义”的“三反”运动，邓塞林被以“贪污”11万元人民币的罪名在万人大会上法办入狱。后经清查核实，邓塞林于同年7月1日平反出狱，时任市委书记纪涵亲自向邓塞林道歉。同年秋，邓塞林被调到淮阳专区合作社任业务科长。1952年年底，淮阳专区与商丘专区合并，邓塞林被调到省合作总社任财务处基建科科长。之后的几年时间里，邓塞林经常到各地合作社实地考察，为全省合作系统的基本建设做了大量工作。

1957年，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，邓塞林被划为右派分子，被开除党籍及公职。

之后，邓塞林与老伴带领儿子回老家萧县劳动，不久移居黑龙江北大荒。在那段日子里，邓塞林历尽艰辛，身体遭受严重摧残，患上了冠心病、气管炎、高血压等疾病。尽管如此，邓塞林仍无怨言，他相信党总有一天能把他的问题弄清楚。

1978年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，这是历史性的一次大转折。根据中共中央11号文件精神，邓塞林被错划右派问题得到彻底纠正。随后，邓塞林恢复了党籍，被安排到河南省供销干部学校任行政科长，直至1982年离休。其间，他不顾年老多病，为河南省供销干部学校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

这张照片是笔者1992年3月在郑州为邓塞林拍摄的。